

生态学视野下的

西漢文學

王长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14005743

I206.2
140

王长顺◎著

生态学视野下的

西漢文學



北航

C169328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206.2

1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 / 王长顺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 - 7 - 5161 - 3242 - 5

I. ①生…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西汉时代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952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李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5

插 页 2

字 数 451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生态学”在学术界中，尚未形成气候，然而在提出“生态学”时，秦汉文学、楚辞研究、生态批评等“生态学”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有关汉玄帝王莽时期《新序》和《说苑》的“生态学”研究，便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生态学”研究的延伸。有关汉玄帝王莽时期《新序》和《说苑》的“生态学”研究，便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生态学”研究的延伸。

序

张新科

长顺博士的论著《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长顺博士好学、上进。2004年9月，他开始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选择我作指导老师，完成了题为《先秦士人道义传统与司马迁〈史记〉的批判精神》的学位论文，在修改、补充之后，以《先秦士人与司马迁》一书出版，受到学界好评。2008年，他又参加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仍选择我作指导老师。他在做好单位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同时，刻苦钻研，勤奋努力，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博士学习任务，其学位论文——《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研究》顺利通过答辩，并得到答辩委员会专家的肯定性评价。毕业之后，长顺没有停止学术上的追求，笔耕不辍，在《文学评论》、《文史哲》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其中多数论文都是以西汉文学为研究对象，也是对博士论文的深化。经过进一步完善，博士论文的修改稿即将付梓，他请我作序，作为导师，我乐于为之。

汉代文学研究，从文献考证、资料编纂，再到宏观的外部研究，自古及今，成果斐然。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对汉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已有学者注意到了汉代政治、汉代经学、汉代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关系等方方面面。单就西汉一朝的文学研究，也有不少专门的论著。“生态学”研究是近年来的热门论题，随之而起的“文化生态”、“生态文

2 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

学”研究也应运而生，蔚为大观。当然，也有学者着手“文学生态”研究，意欲探究文学与其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人性生态之间的有机性联系。长顺博士的这本著作，就是以生态学的视野，将西汉文学置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予以观照，可算作是一种新的思考和尝试。

要真正把西汉文学纳入生态学的视野，将西汉文学自身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都看作一个生态系统，探究文学在产生、发展、嬗变过程中其内部诸要素与外部环境影响的规律，并进一步认识各种环境如何对文学产生积极影响和负面制约，也并非易事。众所周知，西汉文学在先秦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受先秦文化的浸润，取得了大的发展，赋体完备，散文兴盛，史传文学成熟，等等，而这一切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深受其影响。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把握并深入探讨文学与前述诸“生态因子”的相互作用，我们深知其难。对此，该论著没有避难就易，而是运用“生态学”原理，从西汉文学对其“生态环境”的适应、与其“生态系统”的平衡、“生态因子”对文学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这就抓住了“文学生态”这一关键词，并从中寻绎西汉文学样态与其环境之间的生态规律，可谓思路开阔，结构严谨。

科学研究是人们探索未知事实或未完全了解事实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对已有知识分析整理、验证并发现有关事实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实践活动。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同样是这样，古代文学的研究也应当注重把握其发生变化的规律。我们说，汉代文学根植于文化的土壤之中，受政治气候、意识形态、经济基础的促进、影响甚至干预，才得以发展、兴盛和自觉。西汉文学在自身的“存在环境”中，上述诸因素就构成了文学成长的“生态环境”，受“生态系统”中诸因子的影响，使得文学发生变化。那么，西汉文学如何适应其“生态环境”？受到“生态因子”怎样的影响？文学又对自己所处的“生态系统”产生了怎样的能动作用？这些都需要深入思考，从而发现规律性的存在。论著在这些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索。如论著认为，就西汉文学的政治生态来讲，政论散文的嬗变与文学对政治的适应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政治生态的变化影响了政论散文，政论散文为适应政治“生态环境”，就发生

着嬗变，其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生长”的情况就不同。那就是，政论文对政治环境有一种适应性，这种适应性表现为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化决定着政论文的论政内容。就奏议文来说，政治生态的变化，影响着奏议文的生长和发展，越是平稳的政治，奏议文“生产”就越少；多欲政治和衰败危局都会刺激奏议文的“生长”。论著还从音乐文化生态视角，用艺术生产和消费理论，考察西汉前期歌诗的生产和消费性质，并把握其嬗变规律，认为就汉代歌诗的生产性质来说，有一个由民间个体自觉生产到官方组织社会性生产的嬗变；就汉代歌诗的消费性质来说，有一个由娱乐消费到政治消费的嬗变。像这样探索文学发展规律性的结论，论著中还有不少。

人类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要有创新。学术研究要体现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古代文学研究要创新，就要善于发现问题，要善于探究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论著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如论著认为，汉初政治统治集团所形成的楚地故里的地域文化心理，是骚体赋发达的政治生态之一。这就把政治统治集团成员所表现出的对楚歌、楚舞、楚服的尚好，以及对楚辞有浓厚兴趣的现象，与汉初骚体赋的发展联系起来，发现其中的必然性联系。论著还探讨了礼制文化对于文体生成的生态影响，认为西汉时期的礼制乃是文体多样化的成长空间，礼仪文化是文体类别繁衍的土壤，礼仪制度乃是文体生成的“寄生环境”。此外，论著还对西汉博士制度与文学、经学对文论话语的催生、历史散文对政治合法性的论证等问题进行论述，颇有新见。诸如此类，都可从中见出长顺博士的问题意识、理性思考和创新思维。

科学研究离不开理论的应用和现象的实证。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来说，理论的全面把握非常重要，对文献中文学现象的发掘则更为重要。论著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从生态适应、生态平衡、生态影响方面入手，深刻理解生态学的原理，并用于文学现象研究，可谓驾轻就熟。此外，论著还就文学生态的理论范畴作了分析和思考，并就文学生态学的建构提出了初步的设想。这都显现出了长顺博士的理论功底。在此基础上，论著深入挖掘文史资料，在对文本进行细读的基础上，探讨西汉文学生成与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和影响。为了把握西汉一代文学文化的全貌，其对先秦两汉有关文献著作都有所涉及，并引用恰当，论证充分，

表现出了长顺博士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朴实的学术作风。

当然，要从生态学视野对西汉文学进行全面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还会很多。比如，就汉初政治状况来说，诸侯王国、诸侯国与中央的关系问题等，也是西汉文学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态”，它对于文学的影响也应当得到关注。再如，如果把“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话题，置于文学生态学的视野下进行思考，在社会动荡、百姓受难的社会背景下，会有文学与其存在“生态”的不平衡现象，其中的原因仍需要我们再探索。

长顺博士对于学术研究的执着，渗透在包括此书在内的所有成果的字里行间，他把辛勤的汗水洒在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论著的出版，是对前期学习的一个总结，也是以后学术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学问无止境，学习无止境，期望长顺博士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日

目 录

绪论	(1)
----	-----

上编 西汉文学对其“生态环境”的适应

第一章 政论散文对政治的适应	(23)
第一节 政论文与政治环境	(24)
一 政治与政论文	(26)
二 政论文的政治适应	(29)
三 西汉以前古代政论文的历史形成	(32)
第二节 西汉政论文对政治的适应及其嬗变	(37)
一 政论散文对汉初政治治理需求的适应	(37)
二 政论散文对西汉中期集权政治的适应	(45)
三 政论文对西汉后期衰败危局的适应	(51)
四 西汉政论散文的政治影响——以《新语》为例	(56)
第三节 西汉奏议文对统治集团政治作为的适应及其嬗变	(59)
一 奏议文在策略“饥饿”到无为政治环境下的嬗变	(60)
二 奏议文在有为政治到衰败政局环境下的嬗变	(72)
三 西汉奏议文与政治生态	(85)
第二章 西汉赋、乐府对物质经济的适应	(87)
第一节 物质、经济与文学	(88)
一 物质经济是文学发展的基础	(88)
二 文学对物质经济的适应	(92)

2 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

第二节 西汉文学发展的物质动因	(96)
一 书写用品与文学发展	(96)
二 西汉物质经济与书写材料	(98)
三 西汉经济发展与图书事业	(100)
第三节 西汉赋、乐府中的物质文明	(106)
一 西汉经济政策与物质文明	(106)
二 西汉赋中的物质文明	(117)
三 西汉乐府中的物质经济	(124)

(1) 第三章 西汉文体对礼制文化的适应 (127)

第一节 礼制与文体	(128)
一 礼制起源	(128)
二 饰礼与文体	(131)
第二节 先秦礼仪与文体产生	(133)
一 礼仪中的文体生成	(134)
二 文体对礼制的适应	(141)
第三节 西汉文体对礼制的适应	(144)
一 西汉礼仪制度的建立	(145)
二 西汉礼仪中的文体	(149)

(2) 中编 西汉文学与其“生态系统”的平衡

第四章 历史散文与政治的“生态平衡” (161)

第一节 历史散文与政治	(161)
一 史官文化与政治	(161)
二 历史散文对政治的建构	(167)
第二节 西汉大一统政治与《史记》的诞生	(186)
一 大一统政治需要学术总结	(186)
二 大一统政治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修史条件	(189)
三 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催化了《史记》成书	(190)
第三节 司马迁《史记》对西汉政治的建构功能	(194)

目 录 3

一 司马迁《史记》对西汉政治的合法性论证	(194)
二 司马迁《史记》为西汉政治统治提供借鉴	(210)
三 司马迁《史记》以批判的形式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	(213)
第四节 司马迁《史记》中的政治治理目标	(229)
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	(229)
二 人与社会和谐	(232)
三 经济和谐	(234)
四 民族和谐	(235)
 第五章 西汉文学与经学的生态平衡	(239)
第一节 文学与学术	(239)
一 文学与学术的共生	(239)
二 文学对学术的促进	(241)
第二节 经学学术环境下的西汉文学	(242)
一 西汉文学的经学学术生态环境	(243)
二 西汉经学背景下的赋	(251)
三 西汉诗经学与四言诗	(262)
第三节 经学对西汉文论话语的催生	(265)
一 经学强化了“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礼关系论	(266)
二 经学促成了诗学“劝”、“讽”的政治功能论	(272)
三 经学形成了“诗无达诂”的诗歌接受理论	(274)
第四节 西汉文学对经学的影响	(278)
一 西汉散文的释经化倾向	(278)
二 西汉四言诗《焦氏易林》对经学观点的阐释	(286)
 第六章 西汉诗歌生产与音乐文化的生态平衡	(289)
第一节 音乐文化与文学	(289)
一 先秦诗乐舞一体的文化特征	(289)
二 先秦音乐文化与歌诗的共生与互促	(294)

4 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

第二节 西汉音乐文化背景中歌诗生产性质的嬗变	(300)
一 民间个体自觉生产	(300)
二 官方组织社会性生产	(305)
第三节 西汉音乐文化背景中歌诗消费性质的嬗变	(311)
一 西汉歌诗的娱乐消费	(311)
二 西汉歌诗的政治消费	(315)

下编 文学生态因子对文学存在发展的影响

第七章 政治因子对赋的介入和扶持

第一节 政治权力对文化心态及文学的影响和干预	(323)
一 政治集团文化心理与文人心态	(323)
二 帝王政治权力的文学影响	(324)
三 政治因子对文学的影响	(327)
第二节 政治集团文化心理对赋的润染	(328)
一 赋之分类概说	(329)
二 汉初政治集团的楚人结构及其文化心理	(333)
三 汉初政治集团文化心理对骚体赋的介入	(338)
第三节 帝王政治权力与汉赋的鼎盛	(339)
一 帝王政治权力对赋的扶持和影响	(340)
二 帝王显性政治权力与赋作者对赋的共同促进	(348)
三 帝王政治权力与汉赋教化功能的释放	(351)

第八章 西汉文化制度与文学

第一节 教育制度与文学	(360)
一 教育制度的文学影响	(360)
二 教育内容的文学影响	(361)
第二节 西汉教育制度与文人生产	(363)
一 西汉教育制度及教育状况	(363)
二 教育制度下的西汉作家受教育状况	(379)

目 录 5

第三节 西汉博士制度与文学	(383)
一 西汉博士性质及其发展状况	(384)
二 西汉博士制度的文学影响	(392)
 第九章 意识形态因子对赋的渗透	(399)
第一节 文学与意识形态	(400)
一 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功能——以汉初为例	(401)
二 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	(402)
三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405)
第二节 道家思想与西汉文学的自遣主题	(406)
一 西汉时期道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状况	(406)
二 西汉道家意识形态生态下的文学	(408)
第三节 儒学独尊——西汉文学现实精神的意识形态背景	(421)
一 西汉时期儒学独尊的意识形态生态状况	(421)
二 “儒学独尊”意识形态生态中的西汉文学	(425)
 结语	(433)
 参考文献	(436)
 后记	(443)

如，“生态学文”大肆宣传阴谋，无关的“生态学”其已早被“生态学”所取代。

绪 论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在各自所处的一定的环境中产生、成长和发展的。物质世界如此，精神世界同样如此。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对生物的存在环境、人的存在环境开始给予更多关注，并进行理性研究，于是就有了“生态学”。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认识逐渐趋于成熟，又先后有了“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等。近年来，随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学术界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精神世界，思考并总结精神生产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其发生规律，提出“文化生态学”，目的是探究人类文化在生产、发展以至繁荣的进程中，其自身内部各要素之间、文化与其他要素之间依存、生发、激励、消长之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规律，促进文化的繁荣和进步。那么文学作为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精神之花，她不仅仅处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而且作为一个“存在物”，有其自身“文学的环境”，借用人类学研究术语，则可以用“文学生态环境”来概括。也就是说，文学处在它的环境之中，不仅与外界“环境”之间进行着符号交换，^① 同时，也与“环境”中的各种系统，诸如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环境之间发生着关系。有机体和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关系，可称之为“生态”，那么，文

^① “符号交换”理论，系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提出的一个从语言学视角研究社会消费和商业传播（如广告等形式）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理论在本质上属于商品符号学的范畴。他认为，作为个体消费者所消费的社会所指（即符号）所表示的某种特定的意义而非商品产品本身，这种意义一般是由广告传播所赋予的。消费者购买产品并非完全出于物质方面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某种心理需要。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购买商品，是因为在商品与符号之间发现了一种等量关系，即能指与交换价值的关系，相当于所指与使用价值的关系。此处借用这一术语，来表明文学与自身所处环境之间以文字符号进行相互影响的关系。

2 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

学与其“存在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称之为“文学生态”，或“文学生态环境”。

一 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人类的生存、进化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因此，“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思考的关键问题。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对于自然界生态状况的了解越来越深刻，对其研究也越来越细化。但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有意无意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也不得不自食了自己亲手种下的“恶果”。如果翻开人类的文明史，人类生态的和谐是人类诗意生存的前提，而生态的破坏或恶化，则是人生存样态质量降低的因素，也成了现代人精神生态沦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前文所述，如若同人类的生态相类比，文学也相应地处在与其本身相关的一个生态系统中。文学的兴盛是以其生态和谐、平衡为基础的。而在文学生存发展的历史中，文学所处的环境是极其复杂的，面对这一复杂的“生存世界”，总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文学生存路向的思考，于是按照文学的发展规律，去追寻其和谐、自由的生存状态，让文学之树得以枝繁叶茂是文学研究与创作的永恒目的。

文学存在的和谐状态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的和谐结构是相通的，因此，文学生态系统的和谐，必然会带来文学和谐性生存。然而，生态危机不仅发生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同时也发生在精神领域。在人类社会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文学艺术的命运与大自然的状况、人类精神的状况是血脉相连、息息相关的。如何在这一生态系统中让文学之树常青，就成了值得探究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文学生态研究是创设文学研究新理路的需要。“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不同于把以往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简单地整合起来。内部研究的实践常常发生的偏向是形式化，例如俄国形式主义企图找出所谓的文学性。外部研究往往会发生决定论的倾向，简单地把文学归结为某个外部因素的变化，如政治、经济、或者作家的经历、性格等等。就像生态学研究强调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那样，文学生

态学企图贯通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研究，使文学研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① 以往的文学研究，或注重作品内部规律的把握，审美形态的认识，如作品的语言、结构、形象、叙事模式、形式的创新等，以此作为作品给人以美感并产生生命力的标志或根本；或注重文学作品外部环境的分析，诸如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更多地侧重于作品所反映内容的社会背景、作家的生平经历，多从作家历经的磨难中寻找其给予作品以思想的生活积淀。并不是这样的研究和分析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或产生不合适的结果，相反，这样的研究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让人们更为清晰、准确地把握了文学的发展历程，得知了文学作为艺术的审美规律。但却不是文学“生存”的本质研究。

我们再来看看近些年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或借助国外的学术话语进行翻版，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语义学、现象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对文学作品的诸要素进行抽象的理性升华，而没有像禅宗“直指人心”那样去直指“文心”；或把文艺理论撰写成程式化、模型化的教科书，在其中阐释着创作论、生存论、传播论、欣赏论，等等，尽管其中贯穿着或填充着众多作家及其作品的实例，但似乎还不能说明为什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然而，这样的文学理论，都成了“遗忘史”，把自己对语词的用法视为“原意”，而在贬损的意义上把文学视为隐喻。理论因此成为一种“不断的侵蚀，使语意丧失”，冒险赚取高额利润的“无保留的消费”。^②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今天的文艺理论已经过于体制化和学科化了，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中“感性的、质料的、形象的话语”已经被解剖、脱水，制成标本了。所以有学者批评文学理论撇下文学享清福去了。^③ 何永康指出：

当今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正走向“终结”，文学研究正被无所不包的“理论”研究所笼罩。大量文学研究的“学术生产”往往

^① 余晓明：《文学研究的生态学隐喻——文学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② [法]德里达：《哲学的边缘》，尚杰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③ 南帆：《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12日。

4 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

成为体制内循环，研究者“自食其果”的产品。一些不愿“感悟”也不会“感悟”的研究者，热衷于创构“框架”和“体系”，热衷于搬运进口的理论“时装”来“套”复杂的文学现象。这种回避甚至鄙夷文学鉴赏的所谓研究，只能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虚玄而又僵硬！^①

因此，我们试图通过隐喻的方法，用文学生态作为一个系统，去感悟文学现象，体验文学的灵动，以复原文学与精神、文化圈的关系性，恢复文学作品与阅读的整体性，把握文学生长的有机性。

而“一个作家的社会出身，在其社会地位、立场和意识形态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当中，只占一个很次要的部分。”^② 可见文学研究的复杂性。那么，文学在经济、政治、文化诸环境中“生存状态”则更为复杂了。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研究中，文学作品的文本研究成为相对独立的方面，被搁置为“文本”研究，而文学理论的研究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国外文化、哲学新名词、新概念的套用。从文学研究的创新需要讲，文学的生态研究就成了一个突破口。

文学生态研究是解救文学与文化危机的需要。随着人类世界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迅速加快，就文化对其影响来说，大众文化取代了精英文化，现代媒体代替了传统媒介，商业意识淹没了伦理意识。我们以大众文化为例来说明此问题。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曾说：“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大众，而是因为其他人而得其身份认同的，它仍然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次的作品（如大众文学、大众出版商以区别于高品位的出版机构）和刻意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的作品（如有别于民主新闻的大众新闻，或大众娱乐）。它更现代的意义是为许多人所喜爱，而这一点，在许多方面，当然也是与在先的两个意义重叠的。近年来事实上是大众为自身所定义的大众文化，作为文化，它

① 何永康：《主编语》，《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②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4页。

的含义与上面几种都有不同，它经常是替代了过去民间文化占有的地位，但它亦有很重要的现代意识。”^① 这是说大众文化是“别有用心”的人创造出来的以亲和大众的文化，而不是为大众的文化。正如王一川所说：

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无疑属于大众文化。^②

他还进一步说明大众文化，从生产的背景讲，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从生产和消费对象来讲，它是以都市市民为受众和制作者；从愉悦的特点讲，它提供的感性愉悦具有日常性。这种文化凭借现代媒介的快捷优势，以多色彩之长形成了铺天盖地之势以吸引人的眼睛，垄断人们的“精神市场”，这无疑会对精英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文化在现代所遇到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如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危机更应该引起重视。畅广元曾对此作过精准透辟的分析。他认为，在全球化状态下，人类的生存是一种本能生存。其最突出的特点则是人类中心，生存竞争，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掠夺自然、毁灭他物或相互仇视、对抗、杀戮。在这种状态下，就出现了人类生存境界（意识）的危机，其本质就是全球化的文化危机。^③

那么，作为精神存在物的文学，在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境遇中去拯救文化危机则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就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而言，它并不是静态的心灵外现，而是人最充分的存在表现为超越自我的一种愿望与活动，因此，它应在自身的文学性中蕴含着对直接或

^①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表》，转引自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13页。

^② 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③ 畅广元：《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危机与文学的价值取向——人类由本能境界生存走向生态境界生存的文学期待》，《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